

不戴國徽的 衛士

史航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不戴国徽的卫士

史航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沈阳

不戴国徽的卫士

Buda, Guohui De Weishi

史航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4 插页: 5

印数: 1—21,5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英辉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张景富

封面设计: 李国盛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205-01503-0/K·139

定价: 2.30元

同人民共命运

——序《不戴国徽的卫士》

王巨禄

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以十万余言的篇幅写一本书，展示一位最基层的农村调解委员会主任的人生道路和奋斗业绩，这件事很有意义，也很新鲜。

人们对薛广生同志的名字比较熟悉了。前一段，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介绍过他的事迹，引起强烈反响。新闻宣传有其迅速、灵敏、覆盖面广的长处，也有其不能详尽展开、透彻揭示的不足之处。现在，有了史航同志著述的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人们可以从宽幅的时代画面和纵深的历史跨度上认识薛广生这个典型人物，思考更多的问题。

薛广生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从我们辽宁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的杰出人物。他在担任北镇县青堆子村调解委员会主任的十年间，成功地调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从来不把矛盾上交，也从来没有因为民间纠纷而导致刑事案件，为造福于乡亲，稳定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身患癌症住院期间和出院以后，以不可遏制的热忱忘我工作，表现出和焦裕禄同志一样的顽强毅力和拼搏精神。他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同亲属的关系，特别是自己家也成为民间纠纷的一方的时候，他的屈己待人、宽怀大度、言行一致的美

德，得到更深刻的展现，从而使他在调解别人的纠纷时获得了极大的说服力。他多次在矛盾激化，纠纷当事人举刀弄斧的危险关头，毫不畏惧挺身而出，避免了一起起恶性案件的发生；为此，他不止一次被误伤，直至以身殉职，为调解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量生动具体的感人至深的事实说明，薛广生同志是一位品德高尚、无私无畏的调解干部，是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忠心耿耿地奉献自己的优秀共产党员。毫无疑问，他属于党和人民引以为自豪的、代表民族之魂的那些当代英雄模范人物之列。

薛广生这个典型人物的出现意味着什么，给我们启示最深的是什么呢？他并非像雷锋同志那样，手上留着地主刀砍的伤疤，怀着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扑向党的温暖怀抱；他担任调解委员会主任的八十年代，社会风气也与五六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薛广生逐渐成熟恰恰在他走上调解岗位之后，他的大量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恰在近四、五年间更集中突出地表现出来。这就发人深思。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农村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转变，由传统农业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使广大农民迅速富裕起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农民的活动方式、交往方式、家庭结构、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反映这些变化的表现之一，是民间纠纷急剧增多。事关个人或家庭的利害得失，矛盾冲突既尖锐又错综复杂，调解起来难度和压力是相当大的。调解者的品质如何、水平如何、威望高低，受到最严峻的考验、最严格的检查。这种新

形势下出现的民间纠纷的矛盾漩涡，就是“造英雄”的“时势”。矛盾尖锐、考验严峻，会淘汰一批人，也会造就一批人，促使他们从当代的社会环境里，从高难起点上成长起来。薛广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薛广生能够在调解民间纠纷中大展风采，大有作为，关键在于他怀着对乡亲们命运高度负责的一片真情，公正廉洁地办事。这种基本素质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积累的过程。五、六十年代接受学校教育，回乡务农后接受集体主义思想的熏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奉献精神的最初闪现，是从自觉地照顾“五保”老人开始的。沿着这条轨道向前推移，当全村绝大多数农民富裕起来的时候，他对少数“贫困层”寄予深切的同情，给予真诚的帮助。在薛广生身上，屈己待人，舍己助人，宁可自己吃亏受苦也要为他人排忧解难的思想品德，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乡亲们信赖，为在调解事业上获得成功打下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头几年，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曾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道德，讥讽为“黄土文化”而肆意糟踏；把党的光荣传统视为“僵化的教条”而粗暴地否定。薛广生的出现，再一次给反历史、反科学的洋奴论调以迎头痛击。正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党的光荣传统，造就出一批又一批像薛广生这样高尚的人！

薛广生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在调解工作中遇到不少挫折。纠纷当事人侮辱人格的恶骂，曾使他伤心得想打退堂鼓。他个人和家庭也不止一次经历坎坷，其中包括身患癌症

这样沉重的打击。薛广生不但没退下来、软下来，反而越来越坚强，工作越做越出色，他的思想品德越到后来越放射出奇光异彩。原因何在、动力从哪里来？薛广生为乡亲们排忧解难，乡亲们真心实意地信赖他、拥戴他；他遇到挫折，领导集体理解他、支持他；邻居家的儿子为他家修吹风机不慎触电而死，邻居不但不要赔偿，不提任何要求，反而体谅他、安慰他；他身患癌症住院，全村人自动接济他、爱护他……这些都深深地打动着、激励着薛广生，使他心甘情愿地为人民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薛广生这个典型人物是怎样涌现出来的？是蕴藏在群众中的真善美的力量所培养的，是他为群众谋利益、群众又以丰富的政治营养抚育他成长的。从本质上讲是“群众造英雄”！揭示薛广生与群众的血肉关系，是《不戴国徽的卫士》一书的主线和基本主题，也是这个典型人物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启示最深。只要我们能够像薛广生那样同人民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基础，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如何适应当今的特点把调解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也是薛广生面临的重要课题。他结合实践，不断地学习和探索，获得了对这一领域的规律性的认识，讲究并运用调解艺术，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一个乡间调解干部，既没有“高官”的地位，也没有“厚禄”的待遇，但是，他确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正因为这样，他才在平凡的工作中，找到工作方向，探索出工作规律，做出

了显著成绩。显示了正义、公道在人间的权威。人们称颂他为“调处千家事，温暖万人心”的好调解员、“无私无畏”的烈士，一点也不过分。各行各业的同志都有一个认识并掌握本职工作规律的问题。誓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过硬的本领相结合，才能创造出高效益。

稳定社会、稳定大局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同志的共同责任。广大基层调解人员，身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漩涡里，站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第一道防线上，肩负重责，身负众望。但愿从调解工作的岗位上，从我们的党员队伍中，涌现出更多的薛广生！

引 子

村里的调解委员会主任，划不进我国正规的行政系列，只带点“神经末梢”的性质。他们原来属于工分干部，至今仍然没有额外待遇，也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只在辛辛苦苦地尽义务。但这些同志却是为农民“断案”的炕头上的清官，是维护大局稳定的要员，因为他们最靠近民间纠纷的爆发点。

村里的调解委员会主任，按所属关系来讲，算司法部门统辖下的一个细胞。他们身不穿警服、头不戴国徽、腰不挎电棍，除了动唇舌以外并没有强制性的手段。然而，这些同志却是坚守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第一道防线上的忠诚卫士，因为民间纠纷激化而无人调解，手起刀落之间就是一桩血案！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结构、家庭结构、道德观念的变化，随着人际间横向联系的扩展，民间纠纷显著增加。以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为例，每年就达5000至7000件，其中一些事件是操刀抡棒要死要活的。如果没有基层调解组织发挥功能，即使公检法机关设置得如同个体饭店那样普遍，能顾得过来吗？能不乱套吗？

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辽宁大地上，从普通的庄稼
院里，涌现出一位无私无畏的调解委员会主任——薛广生。
在此说明一点：写入本书的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序

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也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
生命。和平年代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社会润滑剂”，是化解
矛盾纠纷的“减压阀”，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
线”。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力量。

第一章

道德前奏曲

北镇满族自治县青堆子镇青堆子村，坐落在沈山铁路线上，是镇政府的所在地，四周—马平川，同偏远闭塞的穷山沟相比，这里是开化繁华的地面。畅通的铁路公路运输，开拓了农民的视野，缩短了和现代文明的距离，也使传统的农业易于注入商品经济的血液。穿喇叭裤、留大鬓角在城里时兴不久，青堆子村的一批青年农民，裤腿子也随之肥大起来，小伙子的头发长到脖梗下边还舍不得动剪子。穿着打扮尽管是表面的东西，但它也表现出这座村镇对社会风气感应的灵敏度。

农村的经济政策放宽，青堆子村的街面上很快支起卖货的摊床，挂出个体饭店开张的幌子、个体旅店迎客的牌子。一些家在房前屋后搭起塑料大棚，一双双原来只允许撸锄杠的手，如今像绣花似地抠苗眼儿，摆弄精贵的细货。村头一片开阔的集市贸易场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一大批庄稼人，使他们谋求土里刨食以外的致富门路。到现在全村650多户人家，纯农户只占17%，经济活动、人的思想、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薛广生从1980年起担任青堆子村调解委员会主任，兼任村会计、文书、党支部组织委员。十年间，他在复杂的环境里，调解民间纠纷至少有440多起，其中，调处一触即发的纠纷25起，防止矛盾激化7起，避免15人伤亡，把9人从犯罪的边缘上拉了回来。他从来不把矛盾上交，十年间青堆子村也从来没因为民间纠纷而导致刑事案件。

这是了不起的业绩，为稳定社会、造福于村民做出了重大贡献！薛广生为此先后六次被市、县、镇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调解主任。毫无疑问，在看来“不起眼儿”实际很难干的本职岗位上，他尽到了最大努力，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成功的奥秘何在、动力从何而来？他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备与众不同的神通吗？把人物还原到生活的自然流程中去，薛广生并不是抢眼一看就呈现出鹤立鸡群的英模形象，相反，他是个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的普普通通的庄稼汉。

薛广生幼年时和弟弟溜冰车，不慎被弟弟用钎子误伤了右眼，从此在人体的最重要部位落下一处终生残疾。但他并不自卑，一次，他同一位村干部开玩笑：“别看你五官端正，腰条也受端详，我除了两个窟窿（指眼睛）赶不上你，别处都比你强，足够个标准人！要是当牲口卖的话，要我不要你。咱‘四柱’好——胳膊腿硬实！”在穿着打扮上，他总落在时髦的潮流后边，既没有西服，也没有像样的干部服，由于爱人的缝纫技术欠功夫，他到冬天穿的对襟棉袄肚囊子前边总支出一块。但他不责怪媳妇，反而夸她手巧，能把自己打扮得挺“富态”。

薛广生既纯朴又乐观风趣，如果把这解释成适合做调解工作的性格基础，未尝不可。但对一项事业的成功来说，这远远不够，还需要更重要的条件和动力。

在我国农村，调解民间纠纷源远流长，充当“和事老”重任的多是宗族中的长者或大事小情出头露面的“屯不错”。他们往往凭长辈压茬，制约同族晚辈，好言相劝说不服，便臭骂一顿，打几巴掌，便硬性做出了最后裁决。薛广生并没有这种“优势”。他的父亲在日伪统治时期从山东老家逃荒到东北，解放前后都在青堆子火车站当巡道工。六十年代初，国家遭受三年经济困难，这位老工人响应政府“精简下放”的号召，把家属转为农村户口，青堆子村才添了独门孤姓的薛氏人家。论“屯亲”，薛广生和每位村民都能挂得上长、平、晚三辈中的一种称呼，而在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系统中，他和哪支哪股也挨不上边，根本没有说话压茬的资格。

盘根错节的宗族关系尽管还在当代中国农村起作用，但它毕竟属于旧时代留下的残迹，而按党政系统建立起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则更直接更现实地左右着农民的切身利益。这方面薛广生是否具有“压茬”的优势呢？他是青堆子村领导班子中的一员，在群众眼里也算个“官”，但他从来不把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看成是“治”与“被治”的关系，更谈不上靠权势“压茬”。就领导魄力而言，他也欠火。薛广生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在生产队里脏活累活抢着干，占奸取巧的勾当从来不沾边。社员们觉得这个小伙子挺“仁义”，便推选他当队长。但只干了一年便自动辞职了，因为他支不

开套，一看人多就懵头，对农活也不太懂行。社员们又选他当生产队会计，这才落到人尽其才的合适位置上。薛广生自我评价说：“我不是帅材，也不是将材，充其量能当个写写算算的‘文职干部’。”这个人心肠挺软的，没杀过鸡，连别人杀猪都不敢看，他的善良的神经似乎承受不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那种场景的刺激。他又极富于感情，遇着动心的事时常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显然，他做调解工作不是靠权力和压茬的魄力而取得令人惧服的权威。

薛广生获得成功的动力何在呢？如果从追求名利的个人动机去寻找，就像憋在死胡同里一样钻不通。他兼任调解主任，并没有在原有职务之外多挣工钱；成宿半夜地调解纠纷，也没处去领八小时以外的加班费。不图利总该图名吧？说来也怪，薛广生多次参加表彰会，捧回来的大奖状足有一摞，玻璃镜框挂在村委会的墙上，框里的内容却变成了白纸黑字的青堆子村几套机构的人名图表。标志个人荣誉的奖状呢？办公室不贴，家里也不挂。锦州日报的记者曾前来采访过薛广生，但被他谢绝了。

这样看来，薛广生是铁心做个无名英雄，安于默默无闻地效力了。即使如此，也该有闪光的语言吧？实不相瞒，从总体上表明他奋斗志向的，没说过几句。前些年流行一句嗑：“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薛广生接着话茬演变出自己的一句幽默的“豪言壮语”：“我是一锹泥，抹到哪里也不曝皮。”如此而已。

调解好利害关系对立的民间纠纷，调解者确实要有很高的威望，很强的动力。薛广生的成功，要从他和乡亲们的关

系、从深厚的感情基础上去追根溯源……

二

薛广生的父亲薛乃新，一辈子吃够了没有文化当睁眼瞎的苦头。在新中国的明媚阳光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扬眉吐气了，薛乃新的工具兜里曾带上小学生的识字课本，抡镐使扳子的手也曾拿起笔来，从最简单的笔顺练起，试图使自己成为识文断字不再挨憋的人。然而，年龄不饶人。一支铅笔拿在他手中仿佛比一条铁轨还要沉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学再学，才歪歪扭扭地写得出薛乃新三个字。他长叹一声：

“唉，我这辈子只能当大老粗啦！”他和老伴起誓发愿：宁可卖裤子当袄也要把孩子培养成念大书的人！有了知识才不枉活一世。

薛乃新有四个儿子，果然个个争气。老大考取北京工业大学，老二考上高中，老三薛广生、老四薛广才的智力也相当拔尖。正当兄弟四人叫着劲地发奋攻读准备陆续迈进名牌学府的时候，55岁的薛乃新于1962年不幸病逝。对于薛家来说，这是天塌地陷般的灾难，大梁断了，经济来源枯竭了，连喝粥度命都成为问题，老三老四还能按照父亲生前的宏愿继续求学吗？一道书本以外的严峻课题摆在薛广生的面前。他对妈妈说：“广才比我学习好，半途而废太可惜，由我代替爸爸继续供他念书吧！”

就这样，薛广生放弃了自己升学深造的机会，独立支撑起家庭的重担，把田野当作新的课堂，用锄头开拓着人生之路。弟弟薛广才不负兄长的一片殷切希望，后来考进东北

工学院。大哥在北京念书期间结了婚，大嫂留在家里。她本想帮助三弟一把，无奈事与愿违，怀孕、生孩子使她在三年时间里不但当不了劳动者，反而变成消费者。担子都落在薛广生身上。家境最难的时候，摆上饭桌不得不用野菜充当主食。

独门孤姓的薛家尽管在青堆子村举目无亲，薛广生却从非血统关系的纯朴善良的农民中，得到了亲人般的关怀和温暖。他离开校门刚到生产队干活的时候，连锄头都不会使，夹在摆开阵势拿垅的社员中间，他尴尬心慌，就像因贪玩而没写作业的学生羞答答地走进课堂。铲地的行列向前推进着，他看别人，一步三棵苗，锄头下去像尺棍儿量的一样准，左右开弓搂垅帮，锄尖一带熟练地剃除苗眼儿草，谈笑间充满了轻松自如的美滋滋的节奏。而他呢？总觉得锄头不听使唤，握在手里拨拨拉拉仿佛成了一种负担，不得不时常猫下腰来用五指代替锄板。多难堪哪！一大帮人都快铲到头，唯独自己落在大后边，他觉得田垅是那样漫长，自己是这样孤单。着急心切，锄板下被误伤的小苗更多，他自愧自责，难过得泪水和汗水一起滴落……

每逢这种时候，队长便出现在他的面前。薛广生等着挨撻，情愿接受最尖刻的责难。然而，队长却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安慰说：“练出个成手庄稼人，并不比考大学简单。别急，从头来。”队长随手拿过锄头，教给他手眼身步怎样运用，去草留苗松土护根怎样又巧又准，就像老师给他列出一道启迪思路的标准答案。关心爱护他的岂止队长一个人，先铲到头的社员们抹回身来接垅，三下五除二便帮助他解决

了疑难。

评工记分是生产队里的重要活动，得分高低不但关系到每个人的经济收入，还涉及脸面问题。评分的时候，自尊心极强的薛广生默默地溜边坐着，犹如做出了不体面的事情之后等待道义上的审判似的。虽然自己不惜筋力地干了，但活计的数量、质量都不行，只能算个“大半拉子”，得末等分理所应当。不过，考试“背榜”的学生不管有多少理由也免不掉丢丑的名声，薛广生怎能不溜边耷拉头呢？然而，每次评分社员们都不费争议地把他列为中等，他推辞不受、自动降等也无济于事。他完全理解，这是乡亲们看自己家境贫寒、人手孤单所给予的破格照顾。

给予忠厚老实的贫弱者以同情和资助，是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正是在这个温暖的集体里，薛家的困境才得到缓解。农忙季节到来之前，会做铁匠活的乡亲总想着为广生预备几件应手的小农工具，以便让这个不太入门的庄稼汉少费几把力气，多出一些活计。家有缝纫机的大婶、大嫂，看广生母子衣服褴褛补钉落补钉，便帮助他们拆拆洗洗，搭上些布头棉絮，做成虽然不算新、但穿出去能顺得过眼的衣裳。青黄不接时节，左邻右舍发现他家该做饭的时候烟囱还不冒烟，便主动送来一瓢米或半盆玉米面，让野菜锅里能掺上几把粮食……

如此等等，看来都是些细碎的小事，但涓涓溪流在薛广生心中汇成了深情的海，贮备起他对乡亲们的真挚的爱。薛广生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离开校门之后，又在人生的课堂上，从纯朴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关怀爱护自己